

松阳县城“工商联”的前世今生（中篇）

◆ 徐进科

新中国松阳县“工商联”及其开创者

1949年5月，松阳解放，迎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在全面接管、改造旧政权机构和民间团体、组织的同时，县人民政府也接管了万寿宫，准确地说是接管了旧政权设立的松阳县商会的“办公”场所。

根据松阳工商业发展的态势和建立与人民政府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的要求，1950年上半年成立了松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也可能由于清代中后期以来的万寿宫曾是当年江西商人创办的“江西会所”，尽管建筑破损且蛀蚀，早已今非昔比，但商人的气息、商业的气场仍隐含于土粒之中，松阳工商业者也对此情有独钟，可能这也是个原由，经县人民政府同意，铲除了建筑内原有的佛座（许真君塑像），昔日的万寿宫就成了松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的办公场所，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工商联”作为松阳县城一个建筑地标的特指，而不是作为一个群众团体的名称，为松阳城乡百姓耳熟能详。

松阳解放不久，成立了松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会址就在原先的万寿宫。松阳县工商联作为一个全新的群众团体的筹备、创建和“工商联”作为县城一个特指建筑地标的兴建，尽管已经过去了70余年，而70余年的历史烟云仍然淡漠不了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就是时年35岁、担任松阳县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丁日新。

档案资料载：原万寿宫“房屋蛀蚀不堪”不能办公，筹委会拟在万寿宫旧址改建为“工商联”。为改建好新的办公场所，在人民政府的支持下，丁日新亲自挂帅，成立了松阳县“工商联”建筑委员会。为筹建松阳县“工商联”大楼，他广泛发动全县工商界集资捐款，棉布业、国药业、烟草业、茶蚕业、酱酒业和饮食业等行业纷纷响应。据老一辈业内人士生前述说，新的“工商联”大楼建造经费没有一分公家拨款，全部来自民间筹款，主要来自当时松阳县城的商号大户，如国产棉布大来号、大纶号、聚春号、国药业恒春堂、仁寿堂、同福堂、同仁堂、酱酒业裕来号等几大商号捐资更为踊跃，数额也较多。

筹款新建“工商联”大楼，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能够得到纷纷响应，既体现了丁日新在全县工商界中的声望，也体现了其谋划工作的周全。根据县档案馆藏资料，为稳步扎实推进“工商联”大楼的建设，整个工程分为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拆卸工程，即将破败建筑拆除；第二个阶段是新建工程，新的“工商联”大楼主要是兴建大会堂与办公室，1955年2月25日动工，6月10日对整个新建工程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验收，提出了很细致的验收意见，甚至连大会堂南大门门墙（靠门东首）外向内斜0.04公尺，内向内斜0.01公尺，原坡0.025公尺未除、砖柱东（南首）面西北角顶内斜0.01公尺，东角向外0.008公尺等等细微的问题，都由工商联有关人士制成明确的整改表，承建方按整改要求限时整改，确保了大楼工程质量。

解放初期，松阳工商业的发展和“工商联”大楼作为地标性建筑的筹建，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全县工商业界的齐心协力取得的，而丁日新作为松阳县“工商联”筹委会主任，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1956年10月4日，松阳县工商业联合会首届会员大会上，经选举担任首任主任委员，先后当选为第一、第二届县人民委员会委员，曾被错划为右派，“文革”期间遭迫害去世。1983年8月，松阳县县委对其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几经岁月的风雨，历经时代的变迁，“工商联”作为松阳县城的地标性建筑，尽管如今

已变身成为松阳县非物质文化遗产馆，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在松阳百姓中耳熟能详，乃至如今过去了将近70年，大多年过花甲的松阳县城人，无不记忆犹新、无不感慨万分！

西屏镇工商界的“公共食堂”

松阳县城南直街53号正中大门和大窗户上方有一颗大红五角星的建筑，修建于1955年6月，原是松阳县城工商界捐资新建的县“工商联”的办公场所，也是工商界人士聚会议事的场所。

根据档案材料，修建的“工商联”拆卸了建于清代中后期万寿宫的屋架等全部建筑物，建筑立面是否拆卸新建，没有确切的档案材料可以证明，既然是“全部”，应当包括严重破损不堪的建筑立面。修建时，在大体上尽可能地保持原万寿宫的立面模样进行修缮的同时，也进行了较大的更改，主要是将原有的也已斑驳不堪的封建迷信色彩的图画、文字刷成清一色的白粉墙，大门顶上原来应该有的“万寿宫”三个大字，换成了用水泥浇筑并涂上红色硕大的五角星。

主体工程大会堂和办公室建成之后，县工商联在这里正常办公运行。三年多之后的1958年11月，松阳县并入遂昌县，原松阳县成了遂昌县的一个区，原县城西屏镇成了遂昌县的一个直属镇，松阳县工商联组织也就成了西屏镇工商业联合会，仍在原址办公，但不再是全县性只是镇域工商界的群众团体。次年，又遇上了“三年困难时期”（或称“三年自然灾害”），从1959年至1961年，松阳跟全国各地一样，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片面发展工业的政策，导致了城乡普遍性饥荒。《松阳县志》（1996年2月版）有载：在这种情况下，1960年3月，竟还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全县城乡如火如荼“大办食堂”，居民全部进入公共食堂用餐，实行“吃饭不要钱”，工商业界也不例外，“工商联”就成了西屏镇工商界的“公共食堂”。

那时，我正处于虽懵懂但已有记忆的年龄，我依稀记得，1961年上半年的一个日子，母亲一手拉着我，一手拿着装着菜干的饭盒，到“工商联”去吃“公共食堂”，“工商联”的大会堂摆满了家家户户自家带去的破破烂烂的小桌子，满食堂都是饥饿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母亲拉着我挤进人山人海，找到母亲用几块小木板钉起来的自家小桌子，让我站在小桌旁，叮嘱不要走开，自己转身就往食堂放火锅盛饭的地方挤。我怔怔地站在小桌子旁，不敢离开一步，虽然懵懵懂懂，而那景象却是深深烙进了记忆——食堂虽然满是人，但可能是饿的原因，并不嘈杂更没有喧哗，每个人的眼睛好象都很大，凹进去似的，顾不得看人家，只顾自己赶紧吃饭，吃饭那个样子就像抢命似的，一手端着只剩有饭粒的饭盒，一手拿着筷子噤声地往嘴里扒几近没有了的饭粒。其实我自己也就是这个样子，自己看不见自己而已。一会，母亲盛饭回到小桌旁，将菜干和不多的饭粒拌在一起，说是很好吃的菜干饭，让我吃，不一会我就吃完了，才感觉到母亲自己没有吃上过一口，那时，我真是饿更不懂事，只管自己抢着吃，根本没想过母亲饿不饿——这是不堪回首的“工商联”“公共食堂”！

《松阳县志》（1996年2月版）记载：“次年（即1961年）6月，公共食堂基本解散”，西屏镇工商界的“公共食堂”也重新回归原位——工商联的办公场所。为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1962年

初，党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随着大会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贯彻落实，西屏镇“工商联”恢复成为其办公场所，重新开始正常运行。但仅不过四年多点时间，时至1966年5月，声势浩大、雷电交加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工商联和镇区其他机关团体一样都陷入瘫痪，停止运行。

“饿”的年月已经过去了60余年，已过花甲之年的我每每依稀想起，总觉得肚子中隐隐有一种饥饿的感觉，因而倍加珍惜粮食。每次吃饭，饭碗总吃得很干净，决不会剩下或粘一粒饭粒；看到自己有饭粒掉到饭桌上，肯定不假思索撮起来放进嘴巴，决不会无端地抛弃；参加朋友聚餐，盆盆碗碗还剩下那许多食物，虽无奈但总有一种莫名的伤感，隐隐作痛于心……

“工商联”不忍卒读的“插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和各地一样，松阳也正处于岁月无序、阴阳颠倒的时期，松阳县城南直街53号，原县工商联办公场所，也因此历经折腾，特别是在“文革”武斗中，民间曾有人戏称为“阴阳界”，后又挪作集会和放映电影的场所。

从西屏镇工商界的“公共食堂”恢复成为其办公场所，工商联重新开始正常运行。但仅运行了四年多点时间，到1966年5月，《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五·一六通知》之后，以遂昌县委工作组进驻遂一中（即现松阳一中）领导师生开展“文化大革命”为先导，旋即声势浩大、雷电交加的“文革”运动，迅速在松阳城乡全面展开，工商联也和其他镇区机关团体一样陷入瘫痪，停止了一切活动，而作为一座建筑，在“文革”中特别是在1967、1968两年，持“夺权”和“反夺权”不同观点的两派之间，初由辩论到互相扔石块，再从棍棒到枪炮，短时间内武斗迅速升级，战火激烈，打得昏天黑地不可开交，西屏镇的南门区域是持“夺权”观点的“遂联总”（俗称总部）一派的势力范围，“工商联”就成了“总部”的一个重要据点。

“总部”得胜时，正值上头为做好反苏修侵略的准备，按照1958年上级曾作出的“实行全民皆兵”的思想和“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的决定，再次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高潮。于是，得胜掌权的“总部”就雷厉风行地成立了“松阳区民兵师”，松阳“总部”一文一武二个头领，武的钟姓头领是部队转业到松阳造纸厂的职工，就任师长，原是镇篾业社的篾匠是文的头领，就任政委，1967年冬季，在南门外溪滩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松阳“民兵师”成立大会，双双披着军大衣，身后还紧跟着几个“警卫员”，俨然是俩大将军，在一片欢呼声中先后上台讲话，其场面和声势记忆犹存。“工商联”就成为“民兵师”有时议事的重要地点。

记得，那时属“遂联总”的遂昌县婺剧团有一个组织叫“新文艺兵团”，在松阳和遂昌全县都很有影响，主要是因为“文革”前他们经常到松阳演出，其精彩的演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几个骨干演员又都很热情活跃，“文革”初期，他们自己编排的以当时遂昌县委书记、县长为嘲弄对象和“老俩口学毛选”等小戏风趣幽默、生动活泼，至今，许多上了年纪的西屏人还留有深刻的印象。不久，他们也卷入激烈的武斗之中，婺剧演员年轻又有“武功”，他们操起棍棒、拿起枪支投入武斗也以勇敢善战著称，他们一出场，持不同观点的组织名称叫“遂总指”（俗称指挥部）的一方就有些胆怯。因此，“新文艺兵团”更多的是担当救援的战斗队，哪里吃紧就赶到哪里，西屏同派的“战事”吃紧，他们就火速从遂昌县城

赶到西屏，战事结束，就入住“工商联”，西屏同派的“战友”对他们都很敬佩，“工商联”也就是现在“申遗馆”楼上房间的板壁上还留有“向新文艺学习”“必败遂总指”之类的墨痕。

《松阳县志》（1996年2月版）记载：“1968年2月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西屏镇武斗；6月14日，西屏再次发生武斗；6月16日，上河发生武斗”。这几次武斗一次比一次打得惨烈，双方都被子弹射中“牺牲”了几个，“总部”这边是“新文艺兵团”一个演艺很好的年轻演员和遂一中“红革会”的几个“革命小将”“光荣牺牲”。战斗结束后，他们的战友们将他们的尸体，用门板扛着抬到“工商联”，平躺在一楼的几间房间，覆盖着白布，房间门锁着，战火平息后，来“工商联”凭吊或隔着窗户围观的人很多，我也曾挤在人群里观看，亲眼看到几间房间里都躺着死人，很吓人的，就赶紧退出人群不敢再看。“工商联”里面的大会堂布置成灵堂，死者亲属的哭声惊天动地，抽泣十分悲怆，整天乱哄哄的一片嘈杂，听到旁边也是来围观的中年人说“工商联成了阴阳界”的话，人虽不认识，而此话却还记得。那时，真感到“工商联”是很可怕的地方，以至于好长时间不敢进去，路过也赶紧匆匆走过，那阴影在脑子里总是挥之不去。

1968年下半年起，以古市区赤寿公社成立革命委员会为开端，和各区、公社一样，西屏镇也成立了“革委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工商联”成了“革委会”直接管理的公房。

公房白天主要用作召开大会的场所。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西屏镇“革委会”召开的大会要么在戏院召开，要么就在“工商联”召开，记得连续几年西屏镇知识青年下放的“欢送”大会，都是在“工商联”召开的，1977年5月份，我也在这里先是大会“欢送”，然后发来的一朵大红花要自己戴上，手捧大会上给下放“知青”人手一册发的“红宝书”，从“工商联”南边门出来，沿南直街到人民大街，过太平坊、“红太阳牌楼”一直游行到城北的汽车站，一路敲锣打鼓被“欢送”到农村插队入户。

晚上如果不开大会，公房主要就是用作放映电影。那时，在“工商联”放映的电影是要跟别处放映的电影“跑片”的，有时，跑得不太及时，电影就卡了、断了，于是整个大会堂漆黑一团，叫声、口哨声响成一片。即使这样，那时，买张电影票的难度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下午起，碉堡枪眼般大买票的窗口前早已人山人海，没有一点力气和“挤功”，电影票难买到。1975年下半年放映计划生育的科教片，记得那是第一次公开涉及男女生育之事，几近轰动。“工商联”大门前黑压压都是男男女女的年轻人，男的哼哼哈哈地在挤、在推、在揉，女的有点不好意思似的也在挤、在叫、在嚷，有“胆杆”（松阳话，意思是勇猛不怕死的）一样的在同伴的托举下，竟也在挤的人群的头顶上爬过，将手伸进窗口；有机巧的从贴近窗口的墙边慢慢插进人群，攥着钱的一只手伸进窗口，用手指头比划着要买的张数，这样灵巧的办法是机灵的年轻人采用的，能比较轻松地买到票。

“工商联”成了镇里开大会或看电影的重要场地，虽不是原先修建“工商联”的本意，但也体现了公益服务的功能，对于当年为修建“工商联”出资出力的人士来说，尽管无奈，总多少还是一种慰藉。而曾一度成为“夺权”一派的据点，放死人、设灵堂，哭声悲怆，哀号满堂，对于当年捐资修建、意在为松阳工商业发展服务的工商联组织和当时仍健在的原工商界人士来说，是说不出的内痛，也是一个时代让人不忍卒读的“插曲”。

好在，岁月回归正常，不幸都已过去！